

舊農業與新農業

李樹青

敗日本。因為在德蘇開戰之後，英國地位穩定，美國不必亟亟援助英國，而可分一部分的力量來援助中國，在消極方面以牽制日本，使其不能乘機北進，進攻蘇聯的西伯利亞；在積極方面，美國為謀將來的安全，實有先解決日本的海軍之必要，以防後患。美國空軍人員的來華，幫助中國重建空軍，就是一個極好的說明。

(二)對於日本有害無益，不論德蘇兩國誰勝誰敗，均非日本所樂聞。尤其在目前，使日本感受不安。(1)德蘇戰後，日本與歐洲失去聯絡，與德義更無路相通，在經濟上，勢將發生困難。美國倘於此際，加緊封鎖，即足以促成日本的崩潰。(2)德蘇開戰之後，大西洋的危機，頓趨緩和，英美可傾其全力，貫注太平洋，使日本南進的機會成為過去。(3)日本唯一的出路，只有北進，乘

蘇聯之危，進攻西伯利亞，但此事仍屬冒險，日本有所不敢。第一日本陷於侵華泥沼之中，無力北進；第二日本果若北進，英美決不能置若罔聞。南進與北進，似屬一事。(3)日本既處於進退維谷的困境，當以採取觀望政策 (Wait and See) 為得計，但至德國戰勝蘇聯之後，日本在國際上勢將失去其地位，加以目下德軍佔優勢，使日本國內的德義路線者，更加躍躍欲試，輿論界意見紛歧，使日本當局，無所適從。履行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乎？抑或遵守日蘇中立條約乎？使近衛文磨日夜不安！

要之，德蘇戰爭對於中國抗戰，有利無害，但以蘇聯勝利為條件，所以我們在此，期望着紅軍捷報的傳來！

七月十三日上海

法國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教授伯納費氏 (Prof. Bernard Fay) 曾經在一九四〇年三月間的紐約時報週刊上，發表了一篇討論歐洲問題的文字。在開首的幾段裏，費氏把歐洲與美國的農業，作一番極有意義的比較。讓我們儘先來看這位法國教授的話 (註一)

歐洲的生產主要地是靠着農業。當着我們歐洲人使用「農業」這個名詞時，我們的瞭解是按照它的真正的意義與內容。在美國農業是另一種工業——另一種盡可能地完全與有效的利用土壤的方法。但是，歐洲卻與此不同。歐洲的農業是一種在土地上謀生的方法。

在美國從開始的時候起，移去而定居下來的僅是暫時的狀況。等到他把一塊土地的膏腴性用竭了，單純地便遷往另外的一塊。在舊大陸上，農業始終是具有地域性的。農民們一代繼續一代居留在一塊地面上。有

許多地方 (如法國中部、布瑞塔尼 (Britany)、諾曼底 (Normandy)、蘇格蘭西班牙北部、德國西南部、義大利的東北部與中部等地) 農民居住的長久竟達一千年或一千二百年。

就廣泛的立場言，所有歐洲的鄉村人口，在六世紀與十二世紀之間，使已經定居到他們目前所在的地方了。因居住久遠，所以創造出五百或六百個地域的單位。他們都希望在自己所佔有的土地上，盡可能地快樂的生活。經過年代愈多，他們便給每個單位加上更多的價值。在這些大小不同的團體裏，因為要密切地適應土壤、氣候、與地形的關係，造出了各種不同的風俗習慣、藝術形式、文學與雕刻的派別，以及政治與社會制度等等。

依據費氏的意見，在新大陸，農業是另一種工業；在歐洲，農業則係一種謀生的方法。這是兩者間的主要區別。因為美國農民把農業看作工業，在無利可圖時，他們當然拋棄了舊的農場，再遷往一塊新地，反之，舊大陸的農民

119496 既然依靠農業作一種謀生方法，拋棄農場事實上同時拋棄了生活。所以他們祇有珍惜自己的田園廬舍，把一生的精力，一代一代的都化費在這塊地面上。久而久之，農場裏面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對他們都會發生濃厚的感情與豐富的意義。結果是再也不肯離去。這不僅造成歐洲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原因，還栽培下不斷的紛爭的種子。

威爾遜紀氏 (Prof. Wilson Gee) 也會在他的農業的社會經濟 (Social Economics of Agriculture) 一書裏，把新大陸與歐洲的農業狀況，作過一番對比。(註二) 威氏的說法，偏重在社會現象，並未能把二者間的異點，從根本上加以發掘或比較。為着簡單起見，我們把新大陸的農業叫着新農業，舊大陸的舊農業。後者的代表不是歐洲，而是比歐洲更加古老的中國。希望從這個比較中間，可以使我們對我國農業的特質，更易於辨認出來。

II

歐美學者常是把現代文明分成兩大範疇：一個是「現代工業文明」(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另一個便是「植物文明」(Vegetable Civilization)。這兩種文明最基本的不同點，在乎從事生產時所使用能力的來源。現代工業文明所使用的生產能力，其最主要的來源為礦物，如煤、石油、自然瓦斯及水力等。這種能力也稱為「無生的能力」(Inanimate Energy)。植物文明的生產能力的來源，最主要的就是取之於植物，也叫作「有生的能力」(Animate Energy)。新農業與舊農業的不同，也正如這兩種文明的不同一樣。新農業的生產是使用無生的能力，舊農業則使用有生的能力。

原來我們的物質世界便是一切能力的貯藏所。所有經天星宿都是儲存能力的淵泉。惟就人類而言，能力的主要來源卻為太陽。通過了光與熱，太陽把能力送給了葉綠植物 (Green Plants)。葉綠植物再把它造成脂肪、澱粉、蛋白質等物，作為動物可能消化的食料。因此，葉綠植物是太陽的「能力寄存所」，轉過來，又是動物的「食物的寄存所」。人類用植物或動物為

食料，就這樣直接或間接的得到了太陽的能力。

在所謂「生物的循環」裏面常有一部能力游離出這個偉大的「生命的化學輪」(Chemical Wheel of Life) 以外。沉入地層，潛藏起來。例如地下的煤、石油、自然瓦斯、淡質與硫質的沉澱物等，都屬於此類。這類潛藏的物质，其所含蓄的能力之大，實遠超過上述有生能力在千萬倍以上。

對於我們人類而言，有生能力是每天從食物裏得到的，所以，也稱為「隨時的收入」(Current Receipts of Energy)，無生的能力是由於堆積及貯藏而來的，所以也名為「儲藏的供給」(Store-up Supplies of Energy)。(註三) 前者譬如吾人每日賺得的工資，按元按角的收入，繼續不斷。後者像似銀行裏面的存款，一經動用，便是一筆巨數。在十八世紀末期工業革命以前，人類所利用以從事生產的，殆全係隨時得到的有生能力。直到工業革命以後，人類利用能力的技術進步，除去應用有生的能力外，還可駕馭地層下面無生的儲藏着的能力。工業革命是人類管理並利用能力的一大進步，同時也就是文明的進步。而我們所要分析的舊農業與新農業，也就從這裏劃分出一條界限。

III

在舊農業裏所利用的有生能力的代表，還可分成兩類：一類是農業工人，另一類是農畜。在人的方面，則有男女老幼的區別，並不是每人所具有的能力完全相等。一個男子的生產能力，由於生理上的差異，普通總是優於女子。這可以說明在需要人的勞力的農業社會裏，為什麼常會發生重男輕女的現象。(註四)

舊農業的生產，普通都是藉助於所謂雙手的勞動 (Hard Labour)，再加上簡單木製的工具的幫助。木製的工具常是極劣的機械，並不能增大手工勞動效率多少。因此，就必然需要大量的勞工，從事農業工作。據調查，中國種植一英畝麥所需要的人工勞作須得二六日，美國只需一·二日，中國一英畝棉花，五三日，美國一四日，中國一英畝的玉蜀黍，二三日，美國則只二五日。(註四) 因為需要人工勞動的數量的龐大，則一個側重家世綿延的

人本主義思想，就很容易得到一般社會的同情與贊助。

生產技術與勞工供給又常是互為因果的。因為生產工具的拙劣，常常需要巨量的勞工；但是，倘如勞工的供給過於豐富，必然會使工具的改良，受到阻礙。農業機械的利用，絕大多數是為着節省時間的。中國的賤價而大量的勞工，不但直接阻止了機械的應用，還在和一切潛在的動力源流作生死的競爭。這在說明了，為什麼中國的農地面積有百分之九〇是種植穀物的，美國則只有百分之四二。換言之，即在中國的農地面積裏，僅有百分之二一。一是留為飼養牲畜的牧場；新農業的美國卻佔有百分之四七。（註五）羅斯教授（Prof. E. A. Ross）在華的觀察是對的：「牧場與草場是不存在的，因為土地實在太寶貴了，不能用以生長飼養牲畜的飼料。」（註六）

人庶的衆多與工具的拙劣，就把中國農業技術逼成爲高度發展的園藝。至少在美國人看來是如此。挖土的工作是精細的，鋤草是勤苦的，插秧是整齊的，築堤、造堤、引水排水，都是經過一番精工製造。肥料的應用，普遍地採集到動物的排洩物、植物的灰屑，以及河曲溝渠的游積物、沈澱物等等。農業技術雖然發展，卻並未能使中國農民利用其一切可能耕種的土地。據美國農部農業專家貝克爾氏（Dr. O. E. Baker）的估計，中國農民僅只耕種了全部可耕土地的三分之一。（註七）金陵大學的調查，則耕種了本部面積的四分之一。美國的農民數目雖然遠比中國爲少，但爲其所開墾的耕地，卻較中國高出一倍。這並不是全然由於氣候土壤與地形的關係，仍然在表示新舊農業的不同。

四

農民的耕種土地的能力或墾殖力（Cultivability），不決定於其人口數量的多寡，主要地在乎使用何種能力。這一點還須細加剖解。

在目前中國農民的生產技術下，耕種的能力，據齊默曼教授的意見，是決定於以下兩個原素：一個是時間，另一個便是每單位土地面積所能生產的數量。（註八）前者決定了最高可能耕種的面積，後者因現存人口的需要，決定了必需利用土地的深度。換言之，就是前者決定每個農戶所能耕種的

畝數或量的限制；後者決定農戶每年必須利用耕地的次數或質的限制。這受這兩個原素限制的，土地，都將無法或無力使用。

所謂時間原素，即農作物從生長到成熟所需要的時間。穀物的成長，季候風爲最重要的原素之一。季候風每年都把各種穀物的播種、耕耘，以及收穫等農作活動，規定在一個固定的時限內。這些工作，必需及時完成，否則便將歉收或竟致顆粒無收。中國農民所使用的能力是微小而緩慢的，所使用的工具是拙劣的，因而一切工作部需要較長的時間。即以鋤地一項來說，據貝克爾氏的估計，一個中國農民倘能得兒子和僱工的幫助，可以在一星期內鋤完一英畝的土地。若是農民一個人工作，至少得需時半月。（註九）其它工作當然也需要同樣冗長的時間，纔能完成。因此，在農作活動與穀物成長兩者的時限中間，便決定了農民所能利用的農田面積，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不會存在如美國及德國東普魯士一帶的大農場，人口的擁擠固是一因。上述時間限制尤爲重要。所以即使在地曠人稀的區域，如東北及西北，也從未出現過美國式的農場。

中國每一農戶所能利用的土地面積既小，因而每單位所能生產穀物的數量，便非常重要。現存的人口數目是龐大的，即就每家農戶的人口數而論，平均總是在五人與六人之間。這些人口對於食物的需要，自然要受社會上所流行的生活程度的影響；中國農村的生活程度固然很低，這是事實，但因人口衆多，爲人口所需要的食物量，也是相當的巨大的。這就是說，人口需要與每畝產量，已然決定了中國農民必需極其集約地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那一塊狹仄的地面。農民必得耕種土質比較肥沃的土地，同時也必得把農業當作園藝。不然他們都無法謀得一家數口的生存。

中國農民的耕種力或墾殖力，就決定在這兩種限制上面。據中央農業實驗所估計全國農地經營實況（民國二十四年）華北在二〇畝以下者，至少佔百分之四八·六，華南在一五畝以下者，至少佔百分之六七·一。另據翁文灝部長計算，全國有百分之八三以上的人口，擁擠在佔全國面積尚不到百分之二一·七的五個區域裏。（註一〇）中國農民的墾殖力，該是這兩個現象最好的解釋。

五

舊農業既然主要地靠着有生的能力，新農業靠着無生的能力，去從事生產。現在讓我們把利用這兩種不同能力的工作性質，再加一番探討。從這裏面也可看出其對墾殖力的影響。

在有生的能力中，人的勞動具有兩種特性：（一）工作遲緩，唯能做得精細及緻密；（二）勞動與生活不能分開。由於前一特性，中國的農業纔變成了園藝。後一特性，還得再加解釋。上文說過，人與牲畜的能力是每天從食物裏得到的，所以名為「隨時的收入」。人力勞動的可能致用，就必得事先吃飽。不但農忙時得吃飽，農閒時也得吃飽。因此，耕地一經利用人工，便自然而地建立下一種有機的循環關係。即有勞動纔有生產，有生產纔有糧食，有糧食纔有生活，而有生活纔有勞動。在這個連環裏面，不能缺少任何一個環節。當然這係一種極端的過度的說法，但卻具有非常的固執性與真實性。

牲畜的能力，與人的能力相似，也得從每天的飼料內得到。但農畜的工作，顯然比人工迅速。在農業生產裏，倘能用畜力代替人工，即可在季候風所規定的時限裏，耕種較大的土地面積。不過使用農畜耕田，也同樣得建立下那種有機的循環關係。換言之，即農畜與人同樣要消費掉所生產的穀物的一部或大部。農畜雖可能增大農田的耕種面積，卻減少了每單位面積上所能養活的人數。（註二）因此，倘如一個農家所經營的農田面積有限，他們便無力喂養一頭牲畜。在中國農地的面積裏，牧場所佔的比例之小，換言之，即在農業經營裏面，使用畜力之少，就是因為農民怕牲畜吃掉了養人的土地或糧食。

人力與畜力都會建立下有機的關係，而舊農業的生產又靠着這種有生的能力，所以中國與印度以及東歐諸國的農業，便必然地是自足經濟。因為農民自其狹仄的地面所能生產出來的穀物或糧食，僅足夠勞動者自己和其一家的食用。不會有多的賸餘生產物，送到市場去出售。間或他們利用牲畜，從事增產，結果除去人與畜的消費以外，仍屬賸餘有限。因此，一個地方性的市集或「街子」，就可以完全滿足農民在貿易上的需要了。最主要的

與大多數的農民，還是都在度着「從手到口」的生活。所以舊農業中農民的低生活程度，殆已成爲無可避免的命運。

利用無生能力從事生產的新農業，便完全與此不同。機械在煤油、汽油或電力的驅使下活動着。因為能力的龐大與工作的有效，可使季節中各種農事活動，均可迅速完成。這就是說，新農業可以不受時間原素的限制。換言之，即是在農作活動與穀物成長的時限內，可能耕種大量的土地。假定農業的活動季節爲一五〇日，若用機械代替人工，耕耘與收穫期間可以從五〇日減到一〇日，留給穀物成長的期間是一四〇日。這在用手勞動時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因此，利用機械，即等於減少在田間工作的日數，加寬了對穀物的選擇，同時更因其大規模的工作與經營大量的土地面積的特殊能力，所以高度機械化的農業，纔能以有效地並成功地開發土質較爲貧瘠與生產量較爲低微的土地。美國的約七百萬農民，反能百年左右的時限內，開墾了面積比中國還大的土地，就是因為這種原故。（註二）

農業機械化的意義，實際上還不止如此。人與牲畜都得消費掉其所生產的穀物的一部或大部，作爲食料及飼料，已如前述。若是應用機械來代替人工或畜力呢，不僅能使工作加速經營面積增大，還消滅了利用有生能力的那種有機的循環關係。所以利用一個曳引機、刈打雙用機以及其它機器，代替了牛馬或手工勞動者，即等於騰出多餘的耕地，減少對生產物的消費，增加農業的贏餘，促進農產品的貿易。一句話提高農民的生活程度與必然地走上交換經濟的道路。（註三）

據估計，一個中國農民的一年勞動的所得，最多除他自己以外，還可養活三口人和四口人。換言之，就是僅足他一家的衣食的需要。有時還慮不給一個普通的美國農民，倘能得僱工的幫助，則其一年經營農場的結果，除養活家內三口人外，還可供給糧食與纖維質，給十二個住在城市或他處的人，和兩個國外的人民。總共有十八口人。（註四）此所以中國農業只能是自給的，而美國農業則不但發展了國內，還發展了國際的市場。

六

在新農業與舊農業間，還有另一個必需加以剖解的概念，便是移動或移動性(Mobility)。這可以從物質的與社會的兩方面來說。

在物質的移動裏，可以按照其需要能力的方式的不同，再分成兩類：一類是翻轉土地即上下移動的能力，如耕地、鋤地、滅地等均屬之。據貝克爾氏的估計，在耕一英畝土地到六英寸時，翻轉土壤的重量大約為一、二五〇噸。另一類係在空間平行移動的能力。在農田裏，倘如使用一個單式十二英寸的犁，耕一英畝土地所需移動的距離，平均約在八英里以上。(註一五)這兩種移動所需的能力，都具有決定耕種力的意義。

中國農民所能役使的能力，既然最主要地靠着人力，則其可能致用的能力的總量是極其有限的。因此，農民們不得不把能力很勤慎周詳地節省下來，並且盡可能地用於生產。把生產以外的空間移動，減少到一個極小的限度。於是一個地域到另一個地域間的交通，在農民，便成了一件浪費能力的與奢侈的事情。這種現象不但助長了村落經濟地域主義，以及老子的「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類的「小國寡民」思想，還正如歐洲許多地方的農民那樣，一個農民族會幾十個世紀居住在一個地方。(中國農民當然也會利用一點水力與風力，從事交通，例如帆船。不過最主要的仍是依靠人力。)這就是說，因為缺乏物質的空間移動的能力，同時也就減少了社會的空間移動——即移民的機會。中國較遠邊疆的未能充分開發，這裏也是理由之一。

其次，社會也有上下的移動。這種移動，雖然不是直接與農民所使用的能力有關，但間接的影響也是具有決定的意義的。農民的攀登社會階層，在社會方面，是攀登者社會身份的改變，在經濟方面，是財富的積累與增加。舊農業裏的農民，絕大多數度着「從手到口」的生活，他們無從積累財富，當然也無法改變身份。新農業下面的農民，經營廣大的農場，收穫大量的穀物，獲得巨額的收入，當然他們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多數是極其優異的。所以，前者的社會常是屬於靜態，而後者則屬於動態。

分析至此，使我們記起伯納費氏的話，歐洲與亞洲的農業纔是一種具有真正的意義與內容的農業，美國的所謂農業則是另外一種工業。或是換

句話說，舊農業是一種在土地上謀生的方法，新農業則是一種在土地上謀利的方法。因為有謀生與謀利的區別，所以在前者下面的農民，就必得珍惜田園廬舍，舍此也許再就無法覓得溫飽。而後者的農民則在「他把一塊土地的膏腴性用竭了，單純地便遷往另外的一塊。」正如一個感覺無利可圖的資本家拋棄他的商品一樣。

七

綜結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新農業與舊農業最基本的差異，在乎從事生產時所利用的不同的能力。假如利用的是有生能力，則由於這種能力的種種特質，逐漸發展出舊農業在經濟與社會方面各種必然的現象。這一類的文明，我們便稱之為植物文明。在另一方面，新農業利用無生能力，也創造出另一種經濟與社會現象，我們稱之現代工業文明。農業本身也隨着變成了工業。這種觀察，比較威爾遜紀氏單從社會現象來分析歐美農業的不同，似更為深刻與着實一點。

最後，讓我們再引用齊默曼氏的一段文字，結束本文。(註一六)

我們知道能力的條件便是一個文明的真實的基礎。能力決定可能加以利用的物資的選擇，放置一個確定的成就的限制，管理移動的程度，在普通性形下，還控制整個社會的藝術與工藝的技術，並且通過這些使物質的與非物質的制度，潛移默化。總之，能力的條件充分地決定了文明的類型與其所依存的資源的模式。 一九四一、六一八

(註一) Fay, Bernard,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7, March, 1940, p. 6.

(註二) Gee, Wilson, Social Economics of Agriculture, Chap. VIII.

(註三) 參看 Zimmermann, E. W., World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 Chap. IV, pp. 38—50. 又本文取材於此書之處頗多，同此聲明。

(註四) Zimmermann, op. cit. Chap. X, p. 145.

(註五) Buck, J. L.,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Chap. I, p. 6.

(註六) Ross, E. A., The Changing Chinese, Chap. IV, p. 71.

(註七) Baker, O. E.,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18.

(註八) 參看 Baker, O. E., op.cit.; Zimmermann, op. cit. pp. 88—98.
 (註九) Baker, O. E., in Foreign Affairs
 (註一〇) 翁文灝先生中國人口分佈與土地利用, 載獨立評論一卷三期及四期。
 (註一一) 例如根據雲南稻田的情形估計一條水牛的工作效率雖可約抵八人, 但一牛的食量也在三人以上。

(註一二) Baker, O. 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Land,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Chap. II, Part 2, pp. 100—107, one volume edition, McGraw-Hill Book Co. Inc. 1934.

(註一三) Baker, O. E., in Foreign Affairs.

(註一四) Baker, O. E., in Recent Social Trends, p. 98.

(註一五) Baker, O. E., in Foreign Affairs.

(註一六) Zimmermann, E. W., op. cit. p. 71.

論中國史之整理與重建

羅夢册

一 何為中國之國與中國之史

當中華民族在近百年的歷史困頓中, 從所謂「妄自尊大」走到了「妄自菲薄」, 再從「妄自菲薄」轉到較正確之「自我反省」, 「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的時候, 一般人才痛切地感到有使全國國人多讀歷史, 多讀本國史, 並善讀本國史的必要。

適於此際, 在中國學術研究的領域內, 歷史學的水準也達到相當的提
 高, 已有可能使一二好學深思之士在中華民族之自我認識, 自我批判和自
 我再認識的認識中, 首先他辨明近年來為一些自命開明的士大夫所倡之
 「中國還不是是一個國家」的言論之誤謬, 並進而認識到
 「中國之國」和「西洋之國」(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 乃兩
 種不同類型, 不同範疇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 不能混為一談。

不少人認為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 如英法德意俄美等國家,
 才是國家。中國既不是又不像西洋近代之民族國家, 所以中國還不是一個
 國家, 還沒有一個國家。直至今日, 他們還在嚴重的誤解着「抗戰建國」四
 字所涵之正確的意義。他們似乎是把「戰爭」當作是一個奇蹟, 我們將會
 從這一個奇蹟中無中生有, 白手起家, 憑空地創造出一個國家來, 而不知世
 界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一個奇蹟, 從無人能夠無中生有, 白手起家, 憑空地創

造出一個國家來。「抗戰建國」之正確的意義, 是在中華民族要以「戰爭」
 作手段, 掃除並解放「中國之國」, 在生存和蛻變的途程上所遭受之威脅
 與阻障, 使得「中國之國」能夠自主並自由地存在於現世界和自主並自
 由地從中古式的生活過渡到鋼鐵、煤電的現代。

如果我們不願亦不敢抹殺客觀存在中的歷史事實的話, 我們自不能
 不鄭重地承認: 中國不但早已是一個國家, 早已有一個國家, 而且這一個
 「中國之國」還是一個「薄狹隘的民族國而不為」, 並「薄靡雜的征服
 帝國而不為」之天下為範圍, 四海作疆界, 既無地域等差的隸屬, 又無種
 族高下的區分, 更無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之早已渾然一體, 渾然存
 在並渾然前進, 生生不息之大一統的「國家」。這一類型, 這一範疇的國家,
 可以說是一個舉世無偶, 古今無雙的「國家」。我們無以名之, 只好上她以
 「天下」二字, 稱她為一個「天下國」。我們借用「天下」二字以名國, 好
 像是有點誇大了, 其實則不然。「天下」一詞(自然是中國歷史上所指定之
 傳統的天下) 不但是為中國人所習用, 所喜用, 而且也確是只有中國人最
 能理解這個名詞所涵之政治的和文化的意義。只有使用這個具有特有意
 義的政治述狀詞以名國才能道地的道破「中國之國」所獨有之政治組
 織, 政治生活, 政治精神和國家型態。(關於這個論題, 筆者曾另有一篇「論
 中國之國」的專文討論之。請先參看拙論不是「戰國時代的重演」而是